

脑文本生成与萧伯纳早期戏剧中的伦理表达

Formation of Brain Text and the Ethical Expression in Bernard Shaw's Early Plays

刘茂生 (Liu Maosheng)

内容摘要: 文学作品的创作通过脑文本实现, 而文学的教诲功能则主要通过文学的脑文本转换而实现。善恶的道德规范转化生成的脑文本影响了萧伯纳早期戏剧中的伦理表达。脑文本既能决定人的伦理选择, 也能决定人的伦理身份。剧中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 与其说是由社会环境与个人性格决定, 不如说是剧作家萧伯纳的脑文本作用使然。萧伯纳的善恶伦理观念与道德范例转换成他特有的脑文本, 而其脑文本在戏剧创作中进一步实现了他讽刺社会罪恶、批判社会不公以及伦理教诲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脑文本; 教诲; 伦理选择; 伦理身份; 萧伯纳戏剧

作者简介: 刘茂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 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ormation of Brain Text and the Ethical Expression in Bernard Shaw's Early Plays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brain text, and the function of moral teaching in literature is mainly achiev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ain text of literature. The brain text genera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odness and evil influences the ethical expression in Bernard Shaw's early plays. It can determine the ethical choices of a person as well as the ethical identity. The actors'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and ethical identities in the plays are not so much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is/her personality, but by the brain text of the playwright Shaw. Shaw's ethical concepts of goodness and evil and his moral value are transformed into his own brain text that further realizes his ultimate goal of satirizing social evil, criticizing social injustice and ethical teaching in his early plays.

Key words: brain text; moral teaching;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Bernard Shaw's plays

Author: Liu Maosheng is Ph.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 was an academic visitor at the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arratology (Email: liumaosheng2004@126.com).

萧伯纳（1856-1950）是英国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他的戏剧作品一方面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艺术，另一方面亦被看作是思想家的艺术。在其多达五十余部的文学著作中，萧伯纳用讽刺、幽默的笔触抒写社会现实，反映民众生活，广泛深入地揭示英国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启发公众思考，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从文学本体论出发，通过考察脑文本的生成机制，可以清晰而准确地窥视萧伯纳戏剧创作的伦理目的，因为“从创作的过程看，文学作品的创作是通过脑文本实现的。脑文本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是它的前提。作家最后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只是作家按照一定的伦理规则对脑文本进行加工和组合的结果”（杜娟 4-5）。萧伯纳创作的所有戏剧，特别是其早期创作完成的《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大胆讨论了当时敏感的社会问题，并且明确表明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他特别强调戏剧是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在于鞭挞社会的弊端，剧作家尤其需要在创作中阐明新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义。萧伯纳的早期戏剧创作都是基于特定的伦理规则而对其脑文本进行“加工和组合”的结果。

一、脑文本决定人的伦理选择

1892年，萧伯纳完成了其戏剧创作生涯的第一部作品《鳏夫的房产》。同年12月，该剧在伦敦皇家剧院的演出大获成功，翻开了英国戏剧史新的一页。因家境贫寒，年轻时的萧伯纳亲身经历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感受了贫困带给他本人的困难，这为其创作《鳏夫的房产》等一系列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打下了基础。由于人类的个体和主体行为均受到大脑的控制，根据脑概念与脑文本的运行机制特点与规律，脑概念是作为思维的工具，能指脑概念和所指脑概念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作为人的思维。人的思维在脑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萧伯纳青年时代自身所经历的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其形成关于贫穷的概念乃至最终的脑文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脑文本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既定程序，不仅交流和传播信息，也决定人的意识、思维、判断、选择、行动、情感。脑文本就如同戏剧表演的脚本，怎样的脚本，决定怎样的表演”（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从萧伯纳创作《鳏夫的房产》最初选定的标题可以

看出，关注社会问题、表达道德同情是他明确的主题。尽管《鳏夫的房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但萧伯纳却真实地表达了其创作的初衷：“我的艺术是表达我的道德感和知识分子的理性的，而不是表达我的美感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本来美感就比较缺乏”（Bernard Shaw 13）。面对是让观众获得美感还是揭示社会问题之间的选择，萧伯纳显然选择了后者，并且为之始终。

《鳏夫的房产》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萧伯纳在该剧中以讽刺的艺术手法全景式地描绘了伦敦贫民窟的无序与破烂，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资产阶级剥削穷人的丑恶嘴脸。可以看出，《鳏夫的房产》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揭露贫民窟的房东的丑行，市政当局的假公济私，以及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金钱关系和婚姻关系”（黄嘉德 52）。如同王尔德在其社会风俗喜剧中所揭示的维多利亚虚伪道德一样，萧伯纳希望借助对伦敦贫民窟的真实描写和资本主义剥削穷人的事实，让人们看到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虚伪的婚姻道德观及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本质特性。

随着剧情的展开，人物性格与社会伦理环境依次呈现。具有英国绅士风度的萨托里阿斯及其大家闺秀的女儿白朗琪是代表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外表高尚的中产阶级商人萨托里阿斯“为人专横跋扈，态度盛气凌人。他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向穷人榨取房租多多益善”（黄嘉德 53），他的所有产业和收入全部是榨取贫民窟的穷人所得。对于萨托里阿斯而言，“最有利的买卖就是想办法弄到赔偿费。……房子越肮脏，房租就越贵；房子越体面，赔偿费就越大，因此我们现在就舍肮脏而就体面了”（黄嘉德 69）。萨托里阿斯其实并非其所谓的白手起家，他不仅没有给予穷人丝毫的同情，甚至还以压榨、恐吓、威胁的手段从穷人那里掠夺了大笔财富。

《鳏夫的房产》并没有对屈兰奇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予以细致地描写，人们只知道屈兰奇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亲没有爵位，他必须靠自己谋生，但他有一个拥有高贵身份的姨妈洛克斯台尔夫人。正是这个原因，萨托里阿斯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如前所述，萧伯纳对于童年时代贫困经历的记忆已形成了其固化的脑文本而存储在大脑中。因此，萧伯纳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再次发生作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分析也是通过脑文本展开的。只要分析心理和精神，就要对脑文本进行分析”（杜娟 5）。此时，脑文本是萧伯纳进行戏剧创作的前提与基础。萧伯纳早年的贫困经历通过回忆轻而易举地被提取出来。提取，就是萧伯纳以艺术语言的直接表达，它将不被人们感知到的脑文本以更加具体的艺术形式展示出来，从而被人们理解与接受。脑文本以声音形式表达出来的即为语言，以文字表达出来的即为书写文本，以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表达出来即为舞台表演。萧伯纳将其存储的脑文本全方位地呈现给了观众。可以说，如果萧伯纳没有年轻时代存储于其大脑中的关于贫困与艰苦生活的脑文本，很难想象有其后来信手拈来且

随处可得的创作优势。脑文本的生成与运行规律清晰地再现于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实践之中。

除了物质层面的贫富差距，当时英国的社会道德风气也让萧伯纳憎恶不已——社会上虚伪的伦理道德盛行，剧中的萨托里阿斯就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萧伯纳所描写的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和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虚假与伪善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

伦理选择即人们在面临人生重大事件时所做出的社会性选择。“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4）。屈兰奇遭遇的两次“艰难”的伦理选择使他陷入了尴尬的伦理困境之中。第一次是在萨托里阿斯的别墅里，当他无意中从李克奇斯口中得知萨托里阿斯的钱财全部来自其在伦敦贫民窟出租房屋所得的租金时，他愤愤不平，却无法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最终，他因不愿让萨托里阿斯的脏钱玷污他的生活而宁愿解除婚约。第二次是当李克奇斯找到一条发财捷径并与萨托里阿斯一起寻求他入伙时，屈兰奇最初表现得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这是有违社会道德的行为，但最终屈兰奇内心对穷人的同情与怜悯开始动摇，最后在爱情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他做出了与萨托里阿斯同流合污的选择。

屈兰奇做出上述伦理选择有其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自身经济条件限制的缘故，另一方面便是他懦弱与缺乏主见的性格所致。屈兰奇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从拒绝白朗琪到同意与白朗琪结婚，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化说明屈兰奇是一个毫无主见与人格信念的人。他逐步融入自己最初所厌恶的社会环境并与丑陋、虚伪同行。屈兰奇看似合情合理的行为实则与萧伯纳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更暗示了其社会改良思想的最终失败。青年时期的萧伯纳接受社会改良的思想，他终身为之努力奋斗的政治理想已经稳固地形成了存储于大脑中的脑文本，成为指导与支配其行为的指南。萧伯纳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接受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思想，最终只能像屈兰奇一样随波逐流，并被肮脏的社会所吞噬。

《鳏夫的房产》是萧伯纳揭示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成功尝试，如此直接并大胆地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的现实无疑会刺痛这一阶层脆弱的神经，萧伯纳的这类戏剧也自然被归为“不愉快的戏剧”之列。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份子，他以其切身的感受诠释了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的傲慢与虚伪：他们一方面叫嚷着希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另一方面却无视卑鄙无耻的种种社会弊端。剧中靠剥削穷人而拥有巨大财富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人士就是坚持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萧伯纳的首部剧作虽然获得了演出的成功，但还是招致不该有的谩骂与挖苦，其在维多利亚时期戏剧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却显而易见。首先，该

剧呈现了戏剧创作的全新风格，“既非悲剧，又非情节剧；既非喜剧，又非滑稽剧”（Evans 53）。萧伯纳的戏剧改变了这一时期沉闷、单调的风格，当时的评论家认为《鳏夫的房产》是一部真正指涉现实的戏剧（A Realist Play）。萧伯纳本人称其为具有说教色彩的戏剧，也正符合他创作本剧的初衷；其次，萧伯纳找到了艺术表现的最好方式——戏剧反映社会问题。他以其最擅长的讽刺、讨论等手段全方位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首次情景式地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道德生动地传达给观众，达到了批判与说教的最佳效果；最后，作为一位渴望革新社会、祛除弊端的剧作家，萧伯纳希望通过鞭挞罪恶从而改善社会的初衷从未改变，他借萨托里阿斯之口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与无奈，但也从未放弃建立美好社会的渴望。

二、脑文本决定人的伦理身份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重视对人的道德教诲，这是由他作为伦理家身份的创作所决定的。因为“人的思想、选择和行为，包括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都是由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脑文本决定的。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因此，什么样的脑文本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或者说，什么样的脑文本决定什么样的人”（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3）。作为萧伯纳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生动地描绘了从事不正当职业的华伦夫人与女儿薇薇之间由于社会黑暗造成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的不同，并导致母女俩关系恶化并分道扬镳的场面，从而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华伦夫人的职业》涉及了卖淫和金钱至上的婚姻观等敏感社会话题，并被剧作审查委员会认定为“不道德”而被禁止演出。直到1924年，《华伦夫人的职业》才得以搬上伦敦舞台，结果大获好评。

该剧围绕华伦夫人和其女儿薇薇之间的矛盾展开，有力地抨击了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对英国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女性的压迫，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残酷和腐朽。萧伯纳本人更是明确其创作本剧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卖淫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女人的堕落和男人的放荡，而只是由于给妇女的工作报酬太低，轻视妇女和虐待妇女到了无耻的程度，使比较穷苦的妇女不得不为了活命而卖淫。……首恶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黄嘉德 58）。换言之，如果一个女人有体面、稳定的工作，不必为基本的生计而奔波劳累，同时，她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她就不会选择成为人人唾弃的职业妓女。女人同样也需要爱情，如果可以不为生活所累，她们也渴望理想的爱情生活。归根结底，“黑暗的社会现实是妇女走向堕落的根本原因”（刘茂生 胡旦 16）。华伦夫人

和薇薇就是无法获得正常社会生活和爱情的两个代表性人物。萧伯纳所描写的看似平常的社会现实，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又何止于此？可以说，《华伦夫人的职业》是维多利亚时期最震撼人心、最具道德力量的剧作。

萧伯纳最早创作的两部剧作就涉及了社会最敏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资产阶级对穷人的剥削，一个是穷苦妇女的卖淫。可以说，这是剧作家首次涉及到敏感而又让人不快的主题，可见萧伯纳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洞察思考及予以彻底革除的决心。“文学伦理学作为方法论，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用伦理的观点在历史上和现实上给予我们道德教诲与警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17）。从伦理视角剖析该剧作可以准确把握萧伯纳所提倡的“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问题，鞭挞社会弊端”的创作理念。《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华伦夫人与女儿薇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是简单的母女矛盾。华伦夫人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呈上升趋势，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快速壮大。然而，所有看似繁荣的局面却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对女性的无情压迫和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因为缺乏特殊的技能，大多数女性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在肮脏的工作环境里饱受欺压。女性为了改变生活窘迫的状况，不得不依附男性，甚至不得不从事卖淫的行当。黑暗的社会现实才是妇女走向堕落的根本原因。

华伦夫人的理想职业显然已与社会接受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职业存在巨大的差异。华伦夫人信奉的是金钱至上的哲学，赚钱成为其唯一的追求，因为“有钱就能每天穿件新衣服；有钱，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¹（156）。华伦夫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被金钱全面占领的世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并非他们外表伪装的那样。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虚假与伪善，“要是没有我的钱、没有我的支持、没有利慈的朋友帮忙，你（薇薇）上等人的身份怎么保得住？”（157）她无力抗争社会的压迫，也无力改变充满罪恶的伦理环境，甚至可以说，她也是社会罪恶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她又成为这种罪恶的帮凶。她所流露出的对女儿饱含深情的爱始终让她无法摆脱伦理道德的重压与羁绊。

华伦夫人曾向女儿坦言：“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没有自尊心，女人还值什么钱？生命还值什么钱？……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121）。华伦夫人是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一方面，她的勤俭、率直、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心体现了英国女性的所有善良与高尚美德。她爱自己的女儿胜过爱自己，她竭力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甚至不惜隐瞒自己不光彩的职业；另一方面，她又固执地要求女儿顺从自己的意愿，根本不给女儿任何空间，也不容许其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本文所引均出自萧伯纳：《萧伯纳戏剧集》（第一卷），黄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56页，以下只标注页码。

到了薇薇生活成长的时代，虽然女性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此时女性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人们正在为改变这一不公正的局面而做出努力。与华伦夫人受人压制的恶劣处境不同，薇薇从来不用担心物质生活上的窘境。她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从事律师职业；然而，她并没有被优越的生活冲昏头脑，反而以自身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看清了当时教育制度的腐朽，并强烈谴责其对女性品质和工作能力的扼杀。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物性格，薇薇是萧伯纳所塑造的典型的新女性形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有独立思想、行动果敢、自信勇敢的女性。与薇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英国戏剧中却常常出现任人摆布的“玩偶”女性，她们表面上是家庭、婚姻的忠实维护者，但缺乏主见，必须完全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当危机出现，她们的态度又会表现出摇摆的态势，甚至做出背叛家庭的不道德行为，王尔德的社会风俗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温德米尔夫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薇薇富于理性的智慧，她不依附任何权威，完全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她虽然衣食无忧，但不贪图享受。她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勤奋而充实。更重要的是，她具有与奢华生活彻底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并敢于摆脱她生存的优越环境而走向独立。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从业者，华伦夫人显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妇女应该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做正经女人。然而，华伦夫人却放弃自我，成为她眼中没有骨气的糊涂女人乃至成为下流的妓女。虽然华伦夫人堕落而从事妓女行当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当其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却仍不肯放弃给她带来金钱与耻辱的职业，甚至经营妓院成为上流社会剥削女性的帮凶。正是“工资过低的劳工，养肥了资本主义这个残忍的摩洛神，因而将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姑娘推入了卖淫的深渊”（Goldman 20）。由此可见，正是扭曲的社会现实使得华伦夫人沦为妓女，她既是受害者，又成为施暴者。

萧伯纳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通过对华伦夫人及其女儿薇薇的成功塑造，传达了剧中强大的道德力量，她们的独特身份也更加凸显了戏剧意在传达的主题。本剧的直接目的是对卖淫制度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表现了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决心与信心。“如果撇开社会环境的问题不谈，那么在一个所有社会问题都带有道德色彩的时代里，用道德说教的观点来看待性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阿萨·布里格斯 314）。华伦夫人早年就从事过卖淫的非法活动，长期以来，卖淫就是英国社会一个令人不安且避而不谈的社会问题。在维多利亚中后期，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受到尊重”，相反，她们必须保持“贞洁”，服从严苛的道德约束。妇女一旦不幸沦为妓女，则必定遭到社会的唾弃。“然而，出于同样属于男人的另一种道德标准，一种

远远早于维多利亚时代，就已存在的规范，却使卖淫现象广为流行，它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最大的社会公害”（阿萨·布里格斯 315），而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男子嫖娼的放任与宽容。他们不但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相反，所谓的“秘密生活”甚至成为男子向往的时尚：“一些晚婚的单身汉可能会去寻花问柳，而有钱的已婚男人则可能会去找一位情妇”（阿萨·布里格斯 315）。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堕落的女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卖淫成为那一时期极其普遍的现象。由于存在对女人从事卖淫、男人进行嫖娼不同的道德标准，加之社会伦理环境的变化，英国社会出现了对此类社会问题的批判与纠偏，如 1885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就规定取消妓院，并针对男人的同性恋问题出台了相应的惩治条例。这些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规范了公民获得合法权利的途径和方式。由华伦夫人对待卖淫职业的态度及其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看出，萧伯纳在其戏剧创作中最大程度地诠释了“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的论断。

三、萧伯纳的脑文本与道德批评

维多利亚时期甚嚣尘上的金钱价值观扭曲了华伦夫人的家庭观，她认为金钱是维系良好家庭生活的根本，薇薇终究也没能以包容之心去引导母亲放弃目前的职业，而是毅然决然地决定独自生活。她无法谅解华伦夫人所从事的不当职业，也没有尽到女儿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母女亲情的破裂成为金钱社会家庭关系的试验品和牺牲品。人们迄今仍然可以盛赞维多利亚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或者如撒切尔夫人在 1983 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所言：“维多利亚价值是我国强盛时期的价值”（阿萨·布里格斯 291），但是，这个时期的英国却充斥着“偷情、通奸、乱伦、谋杀、堕胎和放毒——这就是……穷人们的全部乱七八糟的编年史，这就是‘我们的农村’的现状，这就是基督教的和快乐的英格兰”（阿萨·布里格斯 299）。看似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仍深藏着无序、痛苦与罪恶。

事实上，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的穷苦女性来说，她们确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要是你的身份跟那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份远不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121）。华伦夫人的选择是做一个有尊严的自己，但是她的付出岂止千辛万苦。萧伯纳借华伦夫人之口向世人宣示他揭露卖淫等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剧作家首次打破对中产阶级以外的世界保持沉默的默契，而这种沉默几乎保持了两个半世纪”（安妮特·T·鲁宾斯坦 389-390）。萧伯纳对英国社会、特别是英国底层社会全面的了解是其对英国剥削制度进行揭示进而提出批评的基本前提，因而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

萧伯纳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严肃、严苛的道德规范是社会风俗的核心内容，强大的道德助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思想上，它增强宗教力量，

减少怀疑；在心理上，它为一个酗酒、污浊和放荡的世界带来了秩序和清洁”（克莱顿·罗伯茨 290）。就连英国最普通的民众也接受了严谨、勤奋、谦恭、顺从和整洁作为个人修养的必备品质，英国由此出现了一个经济繁荣、文明发达、创造力空前的维多利亚盛世。然而，维多利亚时代过于苛刻的道德规范导致“下层社会的人对道德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上层社会的人则道貌岸然。许多伦敦人都不遵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克莱顿·罗伯茨 294）。萧伯纳社会问题剧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呈现。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代表人物，华伦夫人根本就无视这一时期所谓的严苛道德规范，依然从事、经营社会所禁止的卖淫活动。萧伯纳甚至还让她公开地为自己辩护，讽刺意义不言而喻，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鞭挞卖淫活动本身，更在于揭露和批判滋生这种罪恶的社会土壤与社会制度。

萧伯纳的戏剧生动地刻画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敏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包括伦敦贫民窟的生活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问题和婚姻关系问题，以及肮脏的金钱交易、卖淫等社会问题。正是通过对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揭示，萧伯纳表达了对当时英国社会伦理问题的关切，进一步说明文学是“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7）的基本遵循。由于文学的教诲功能主要是通过文学的脑文本转换而实现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其早期创作阶段完成的社会问题剧，包含了清晰的善恶伦理观念。及至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他们依然保留对伦理问题的极大关注，这一切都“隐喻了具有伦理意识的脑文本在人类生活的无可替代性，即便身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不能指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尚必武 73）。萧伯纳脑文本所生成的一系列道德范例无一例外地在其早期的戏剧创作中完成了完美的艺术表达，最终达到了讽刺社会罪恶、批判社会不公及其他伦理教诲的最终目标，突出了萧伯纳戏剧强大的道德力量。

Work Cited

-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Briggs, As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Trans. Chen Shuping and Chen Xiaohui et al. Pek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 黄嘉德：《萧伯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Huang, Jiade. *A Critical Study of Bernard Shaw*. Jinan: Shangdong UP, 1989.]
- 安妮特·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Rubinstein, Annette T.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Trans.

Chen Anqu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杜娟：“从脑文本谈起——聂珍钊教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8）：1-15。

[Du, Juan. “From the Brain Text——A Talk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2018）：1-15.]

Evans, T. F. ed. *George Bernard Shaw: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6.

Goldman, Emma.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Other Essays on Feminism*. New York: Times Change Press, 1971.

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等：《英国史》（下册），潘兴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Roberts, Clayton and David F. Roberts et al.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2: 1688 to the present*. Trans. Pan Xingming et al. Pek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刘茂生、胡旦：“《华伦夫人的职业》的道德教诲与伦理表达”，《浙江工商大学学报》4（2016）：15-20。

[Liu, Maosheng and Hu Dan. “Moral Teaching and Ethical Expression of Mrs. Warren's Profession.”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4(2016):15-20.]

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Nie, Zhenzhao.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26-3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 8-17。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2006): 8-17.]

尚必武：“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冲突：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工智能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5（2019）：61-74。

[Shang, Biwu. “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tific Selection and Ethical Sele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rain Text in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9): 61-74.]

Shaw, Bernard. *The Complete Preface, Volume 1:1889-1913*. Eds. Dan H Laurence and Daniel J. Leary.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33.

——：《萧伯纳戏剧集》（第一卷），黄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The Complete Plays of George Bernard Shaw (Vol. 1)*. Trans. Huang 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